

华北 1743 – 1744 年与 1876 – 1878 年旱灾中的政府粮食调度与社会后果对比^{*}

萧凌波¹, 黄欢², 魏柱灯²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以《清实录》等清代档案文献为主要历史信息源, 挑选华北地区清代盛期(1743 – 1744 年)和晚期(1876 – 1878 年)分别发生的两次典型旱灾, 对灾害气候背景和灾情、政府措施(特别是政府主导的跨区粮食调度)、社会后果(人口迁徙和动乱)等信息进行整理并分别对比, 可以发现 1743 – 1744 年旱灾期间政府的粮食调度体现出粮食数量大、来源渠道广、调度效率高等鲜明特点, 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而 1876 – 1878 年旱灾则反之, 粮食数量及来源有限, 且转运效率极低, 由此引发严重社会后果。这种转变, 发生在主要余粮产区农业凋敝、南北粮食运道(大运河)阻断、漕运及仓储制度衰败的时代背景之下, 重灾区空间分布带来的交通通达性差异, 也在客观上影响了粮食调度的效率。

关键词: 华北; 历史旱灾; 社会响应; 粮食调度; 《清实录》

中图分类号: P445.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811X(2012)01 – 0101 – 06

在当前及未来气候急剧变化的背景之下, 各类极端气象灾害(如干旱、洪涝、霜雪冰冻等)的频繁发生, 给人类社会的气候适应性带来严重威胁; 考虑到灾害的严重程度远非分散的自救行为所能抵御, 政府如何对自身掌握下的公共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和调配, 使其在维护粮食安全、稳定社会秩序中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是社会响应机制的关键一环^[1]。对历史时期典型案例的重建, 不仅对防灾救灾实践有重要的参照意义, 也可加深极端气候情景下人地互动机制的理解^[2]。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清代华北地区发生的两次典型极端旱灾事件(分别发生于 1743 – 1744 年和 1876 – 1878 年), 围绕两次灾害(特别是后者)的气候背景^[3–5]、灾情程度^[6]、救灾活动及社会后果^[7–9]等方面, 前人研究已取得丰富的成果^[10–12]。本文拟利用《清实录》^[13]等档案史料中的相关记录, 重点对两次灾害期间中央政府(朝廷)向灾区的粮食调度措施进行重建, 对其力度和效率进行评价和对比, 并结合自然、社会背景对其取得的不同效果进行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本文主要历史信息源为《清实录》, 《清实录》

又称《清代历朝实录》, 是清代官修的编年体史料长编, 共 4 433 卷, 其资料来自内阁及各部院衙门所存档案、清史馆所藏资料和著作, 以及皇帝的文集、御笔等, 是清史研究中不可多得的原始文献资料。

《清实录》中包涵丰富的灾害、荒政史信息, 特别是清廷主持下的大宗赈济资金、物资(主要为粮食)的筹集、调度、分配等相关原始记录很少遗漏。本文主要提取了两次灾害中清廷历次跨区域粮食调度的资料, 对各条记录反映的命令下达时间、粮食数量、来源渠道、接收地区、用途, 以及执行情况(如运输方式、抵达时间)等信息分别进行辨识和统计, 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两次灾害中政府粮食调度的力度、效率的直观认识和一定程度上的量化对比。同时, 结合其他历史信息源(如《光绪朝朱批奏折》等历史文献及相关研究成果)对《清实录》记录进行了校订和补充。

两次灾害的气候背景信息主要来自前人研究。本文对灾害引发的社会后果以人口迁徙和社会动乱两方面进行衡量, 历史信息来源除了《清实录》中的原始记录之外, 还包括部分灾荒史、人口史及沿革史资料。

^{*} 收稿日期: 2011 – 09 – 02

基金项目: “九七三”计划(2010CB95010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0901099, 41071127)

作者简介: 萧凌波(1982 –), 男, 汉族, 湖北天门人, 博士后, 主要从事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与适应研究。

E-mail: xlingbo1@163.com

2 结果与分析

2.1 灾情对比

1743–1744 年旱灾始于 1743 年春季，当年夏秋连旱；伴随干旱出现遍及华北数省的炎夏天气，可能是近 700 年中最严重的一次高温事件，日最高气温达 44.4℃，超过现代的气温极值^[3]。在《中国近 500 年旱涝分布图集》^[14]中，华北 5 省(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境内 26 个站点受旱 16 站(旱涝等级为 4 和 5)，其中大旱(5 级)12 站(北京、天津、唐山、保定、沧州、石家庄、邯郸、安阳、洛阳、郑州、德州、济南)。重建的黄河中下游 17 站点年降水量序列显示，该年全区降水约 450 mm，较多年平均值偏少 25%，仅次于 1877 年，为清代又一大旱年份^[15]。旱情一直持续到 1744 年春夏，随着 6 月下旬各地连得透雨，旱灾结束。

根据《清实录》中的赈灾记录，1743 年秋冬–1744 年春夏旱灾期间获得政府救灾物资(特别是粮食)最多的重灾州县主要集中在直隶东南部的天津、河间等府(27 个州县)，河南北部的怀庆、开封等府(21 个)，以及山东西北部的武定、济南等府(12 个)(图 1)。

1876–1878 年旱灾是清代华北地区最为严重的一场旱灾，又称“丁戊奇荒”(以 1877 和 1878 年的农历天干合称)。1876 年华北 5 省 26 站点受旱 25 站，大旱 14 站；1877 年受旱 25 站，大旱 22 站；1878 年受旱 18 站，大旱 13 站，任意一年范围都超过 1743 年，几乎无县不灾^[14]。黄河中下游降水序列显示，旱灾持续时间为 1876 年春季到 1878 年春季，跨越 5 个作物生长季，其中 1877 年降水量 335 mm，偏少 45%，为清代最低^[12,15]。旱

灾中心集中在河南、山西两省，晋南至豫西大片区域 1877 年长达 200~250 d 滴雨不降^[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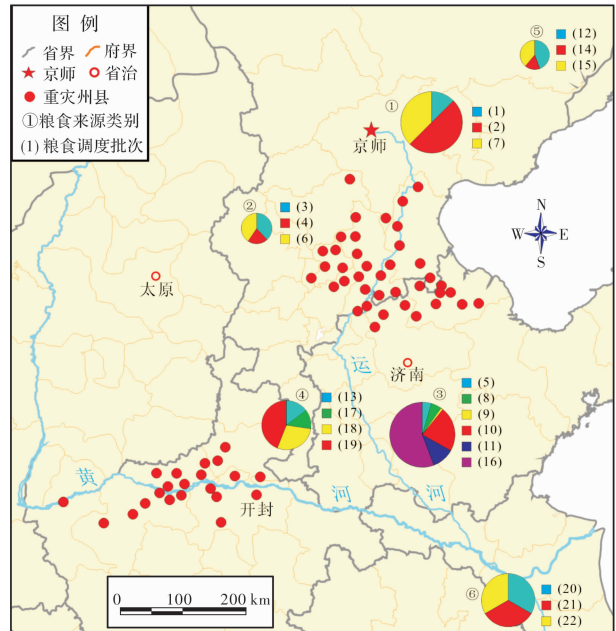


图 1 1743–1744 年旱灾重灾区及政府粮食调度(行政区划据 1820 年)^①

2.2 粮食调度对比

“调粟”为历代荒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赈灾方式繁多，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缓解自然灾害所导致的区域粮食供需关系的失衡，政府能够筹措的粮食数量及运输、发放的效率，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整个赈济活动的社会后果。两次灾害期间，清政府都竭尽所能地进行了跨区域粮食调度，但其效果则大相径庭。

18 世纪中期为清代的鼎盛时段，在 1743–1744 年旱灾期间，清政府的粮食调度活动，以数量大、来源广、效率高为突出特点(表 1)。

表 1 1743–1744 年旱灾清廷调拨华北灾区粮食清单

编号	数目	来源	接收地	用途	原始记录出处
1	米 10 万石	通州仓	直隶灾区	赈济	清实录·1743–08–09(六月二十日)
2	米 40 万石	通州仓	直隶灾区	赈济	清实录·1743–08–26(七月八日)
3	谷 15 万石	直隶仓储	直隶灾区	赈济	清实录·1743–11–15(九月三十日)
4	米 4.2 万石	直隶仓储	直隶部分灾区*	赈济	清实录·1744–02–21(一月九日)
5	谷 8 万石	登州、莱州	山东灾区	赈济	清实录·1743–12–11(十月二十六日)
6	米 8 万石	山东漕粮	山东灾区	赈济	同上
7	米 30 万石	通州仓	直隶灾区	赈济	清实录·1744–04–01(二月十九日)
8	米 4.7 万石	陵稻**	山东灾区	赈济	清实录·1744–04–06(二月二十四日)
9	米 1 万石	鲁豫漕粮	山东灾区	赈济	同上
10	米 20 万石	南方漕粮	山东灾区	补仓	同上
11	米 10 万石	鲁豫漕粮	直隶灾区	赈济	清实录·1744–02–04(十二月二十一日)

① 根据禹贡网(<http://yugong.fudan.edu.cn/default.asp>)数字底图绘制

续表 1

编号	数目	来源	接收地	用途	原始记录出处
12	米 8 万石	奉天	直隶灾区	赈济	同上
13	谷 15 万石	河南彰德、卫辉 2 府	直隶灾区	赈济	清实录·1744-05-24(四月十三日)
14	米 3 万石	口外	直隶灾区	赈济	同上
15	高粱 7 万石	奉天	直隶灾区	赈济	同上
16	米 50 万石	南方漕粮	直隶	补仓	清实录·1744-05-26(四月十五日)
17	麦 6.5 万石	河南	直隶	补仓	文献[7], P160
18	麦、高粱 14.7 万石	直隶、河南、山东	直隶	补仓	文献[7], P160
19	谷 15 万石、麦 15 万石	河南	灾区	备用	清实录·1744-05-27(四月十六日)
20	米 20 万石	四川	灾区	备用	同上
21	米麦 20 万石	江苏、安徽	灾区	备用	清实录·1744-06-27(五月十七日)
22	米麦 20 万石	湖北	灾区	备用	清实录·1744-07-09(五月二十九日)

* 天津、肃宁、故城、宁津、大城、束鹿、深州、饶阳、安平、衡水、新城 11 州县；

* * 本年陵稻(供皇陵工程及驻防官兵粮食)应由山东运输，截留赈灾后，由口外买米拨补；

* * * 19-22 各条，后因灾情缓解，并未起运。

将表 1 中的“谷”按 2:1 的比例折合为米，统计本次旱灾中清政府筹集调拨的赈粮达 318.6 万石，除去未经起运的 19~22 各条，直接动用的 236.1 万石，其中直隶省获得 198.4 万石。

在直隶 27 个重灾州县，大规模赈粮发放可分 3 批：乾隆八年(1743)十一月(农历)开始的“大赈”(分区域和对象发放 2~5 个月口粮不等)以及次年四月和五月的“加赈”(赈期各延长 1 个月)(3 批分别对应表 1 中编号为 1~4、7 以及 11~15)，连同大赈之前对所有灾民发放的八月 1 个月口粮(“普赈”)，灾民最多可获得 8 个月的口粮；到次年麦收为止，直接发放赈济的口粮达 127.2 万石，平均每县近 5 万石；27 州县接受赈粮的灾民 189 万余人^②，平均每人可分配口粮约 108 斤(按 1 石米=160 市斤折算)；这次旱灾中赈粮的发放力度之大，在清代荒政史上极为罕见。

22 批次的粮食主要来源可分为 6 类(表 1、图 1)：

①运河末端的通州仓储(编号 1、2、7)，经大运河水运灾区，80 万石；②灾区省份常平仓储(编号 3、4、6)，就地发放，15.7 万石；③运河沿途截留的漕粮(编号 5、8、9、10、11、16)，93.7 万石；④直隶、山东、河南未受灾地区采买粮食(编号 13、17、18、19)，短途水运或陆运，51.2 万石；⑤边外地区(热河、奉天)采买粮食(编号 12、14、15)，先经海路和陆路，再沿运河航道进入灾区，18 万石；⑥长江流域各省采买粮食(编号 20、21、22)，通过长江、运河航道逐次输送，60 万石。

跨区粮食调度必然受到交通通达性和运费的制约，在交通不发达的清代，最为便捷经济的大

宗货物运输方式是水运。由于此次旱灾的重灾区基本分布于内河航道的干线两侧(黄河、运河)，特别是位于大运河沿线的直隶、山东灾区，可以根据需要灵活截留、就地卸载北上漕粮，并抽调大批漕运机构下辖的漕船投入赈粮运输，从而极大提高了调度效率并节约了运输成本。尽管此次旱灾期间筹集的赈粮批次多、来源广，却从无延误，如 1744 年春季的两次加赈，均为临时决策，但粮食的运输和发放均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第一次为 1 个半月，第二次仅半个月)完成，以大运河为中心的网运系统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发生于晚清时段的 1876-1878 年旱灾期间，政府的救灾活动已被大大削弱，并突出体现在粮食调度方面(表 2)。

1876-1878 年旱灾的持续时间、成灾面积均远超 1743-1744 年旱灾(1876 年华北 5 省成灾州县 222 个；1877 年 402 个，几乎全境受灾，1878 年 331 个)^[11]，而清廷调度下拨的赈粮则远远少于后者，受灾最重的山西省，1877 年 82 个、1878 年 56 个州县受灾，总共仅获得 38 万石粮食，完全不能满足赈灾所需。

从赈粮来源看，1743-1744 年旱灾中占据突出位置的仓粮和采买余粮基本消失，主要依赖各省当年漕粮。由于太平天国及捻军起义之后，漕运体系基本瓦解，除山东漕粮尚能通过北运河河运、江浙部分漕粮改为出长江口海运至天津之外，大部分漕粮均已停止征收(折银)^[16]，向灾区转运漕粮的时间及运费成本大大增加，粮食调度效率随之大减。

② 清实录·1743-11-15(九月三十日)

表 2

1876 - 1878 年旱灾清廷调拨华北灾区粮食清单

编号	数目	来源	接收地	原始记录出处
1	米 1.46 万石	奉天	直隶	清实录·1876-06-29(闰五月八日)
2	不详	山东未批漕米	直隶	清实录·1876-06-29(闰五月八日)
3	米 4 万石	江安漕米	山西	清实录·1877-10-06(八月三十日)
4	米 4 万余石	江安漕米	河南	清实录·1877-10-06(八月三十日)
5	米 8 万石	山东漕米	河南	清实录·1877-10-15(九月九日)
6	米 8 万石	山东漕米	山西	清实录·1877-10-15(九月九日)
7	米 6 万石	江鄂漕米	山西	清实录·1877-12-15(十一月十一日)
8	米 3 万石	直隶平巢余米	河南	清实录·1878-02-22(一月二十一日)
9	米 8 万石	南方漕米	山西	清实录·1878-03-22(二月十九日)
10	米 8 万石	南方漕米	河南	清实录·1878-03-22(二月十九日)
11	米 10 万石	通仓	河南	清实录·1878-03-23(二月二十日)
12	米 12 万石	江苏漕米	直隶	清实录·1878-04-24(三月二十二日)
13	米 4 万石	江北漕米	直隶	清实录·1878-04-24(三月二十二日)
14	米 2 万石	南漕未批米	河南	清实录·1878-05-06(四月五日)
15	米 12 万石	山东漕米	山西	清实录·1878-10-12(九月十七日)

例如此次旱灾 3 年间惟一一次试图动用通州仓米的命令(编号 11),因仓中无米而无法立即执行,需等当年夏秋浙江漕粮抵达后方可划拨^③,前后相距近半年;编号 5、6 的 16 万石山东漕米,10 月下达命令,至次年 2 月方起运^④;而编号 7、9、10、12、13 等来自南方各省的漕米,均为冬春季下达命令,待至当年秋季漕粮抵达天津之后再行转运灾区,完全失去了赈济的时效。

相比 1743 - 1744 年旱灾灾区紧邻运河,运输便捷,1876 - 1878 年旱灾的重灾区(晋南、豫西)远离政治、经济中心,交通不便,运道不畅。特别是山西灾区,地处黄土高原,有太行山与黄河阻隔,由直隶、河南向其运粮历来十分艰难,越过太行山井陘等口的粮食输送线路,运费可达粮食价格的 10 倍以上^[17],这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清政府本已十分有限的救灾活动。

山西获得的第一批截留漕米 4 万石(编号 3),清政府指定来自当时已经运达的江南漕米 8 万余石,同时由河南获得剩余部分;然而命令下达时,河南应得的 4 万余石漕米已然运京,考虑到山西运输艰难,经办大臣将本应运往山西、储备于天津的 4 万石漕米运往河南,而再从下一年漕粮中补划给山西^⑤。这便意味着,灾情最重的 1877 年,清

政府没有向山西调运任何一批大宗赈粮。

此后,尽管清政府竭力筹措赈粮,但其面临的运费问题始终难以解决。1878 年初山东截留的漕米 8 万石水运至河南道口,估算运至山西需运费 20 余万两^⑥;而到当年 10 月筹办次年截留 12 万石山东漕米事宜时,估计运费竟超过 100 万两^⑦;连同其他渠道购运的粮食,都只能由清廷出面,代山西向各省借款充作运费^⑧,各省不仅百般推阻,且多不能足数^⑨;以至旱灾即将结束的 1878 年 10 月,仍有大批赈粮积压在保定等处^⑩。正是由于中央政府粮食调度的不力,使其在此次旱灾救济中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灾区赈粮主要依赖地方政府和民间的分散筹集和发放,赈济规模和效率均无法与 1743 - 1744 年旱灾期间清廷直接组织的赈灾活动相比,赈济形式也以最为经济的煮赈为主,极少直接发放钱粮。

2.3 社会后果对比

1743 - 1744 年旱灾中,尽管直隶东南、山东西北部的旱情一度十分严重,但随着大力调度和发放粮食,失衡的粮食供需很快得以平衡,随着 1744 年灾区秋粮的丰收,旱灾的影响逐渐消除。

旱灾引发了一定规模的难民迁徙,特别是向北进入京师、或是进一步越过长城进入丰收的热

③ 清实录·1878-03-23(二月二十日)

④ 清实录·1878-02-17(一月十六日)

⑤ 清实录·1877-10-10(九月四日)

⑥ 清实录·1877-12-20(十一月十六日)、1878-03-07(二月四日)

⑦ 清实录·1878-10-12(九月十七日)

⑧ 清实录·1877-12-23(十一月十九日),涉及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南、四川、广东、广西等省,计银 50 万两。

⑨ 如江西指定 6 万两,仅拨出 3 万两(清实录·1878-02-19(一月十八日));湖南指定 6 万两,仅拨出 1 万两(清实录·1878-02-20(一月十九日))。

⑩ 清实录·1878-10-03(九月八日)

河、盛京地区就食者甚多。清政府为此放松了刚刚于1740年收紧的封禁政策,1743年秋季和1744年春季两次默许流民于喜峰口、古北口、山海关等地出境^①,并在京城加强了难民收养。该年在京越冬的难民3 000余人^②,出边者约数万,相比以百万计的灾民总数,所占比例很小。由于救济及时,灾区社会秩序十分稳定,没有发生动乱事件。

而1876-1878年旱灾在历史上以人口损失巨大著称,据估计华北5省旱灾期间人口减少约2 290万^[18]。除去死者,还有相当一部分为向外迁出,由此出现了清代历史上空前的难民跨区迁徙活动,其中尤以向东北迁徙的规模为最。1876年秋,在奉天牛庄靠岸的灾民,一天就达8 000余人,估算整个旱灾期间仅山东省向东北输出难民数量可达300万^[10]。清代的东北地区自康熙年间长期处于封禁状态,至1860年才有所放松^[19-20]。1876-1878年大旱引发的“闯关东”浪潮,大大加速了封禁的解除,根据东北清代政区沿革资料^[21]统计,灾中和灾后的短短7年(1876-1882年)间,东北3省新建行政单位(厅、州、县)14处,超过之前封禁时期190年(1670-1850年)的总和(13处)。

与难民迁徙的失控同步的,是灾区社会秩序的崩溃。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但根据对《清实录》的统计,旱灾3年间,华北5省有50余处地点曾出现成股盗匪,聚众至数百人、上千人的8起,抢粮、抗税等民变事件更成为普遍现象。

3 讨论与结论

与1743-1744年旱灾相比,1876-1878年旱灾中政府大宗赈灾粮食跨区调度能力的严重削弱,直接导致了政府赈灾活动的捉襟见肘。从本文研究来看,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1) 仓储及漕运体系的衰落

清代京、通仓(中央)、常平仓(地方)、社仓/义仓(民间)的三级仓储制度,以及由南向北的漕运体系的正常运转,是清政府保障粮食安全、防灾抗灾的基础。当1743-1744年旱灾发生时,仓储与漕运制度已十分完善,每年400万石以上的运京漕米,使京、通2仓贮米常年保持在近千万石,其中通州仓在100万石以上^[16];各省常平仓储额保持在3 000万石左右,其中受灾的直隶、山东、

河南3省储额均超过200万石^[22],可满足借贷、平糶所需,并承担部分赈粮发放。旱灾中,赈粮来自通州仓储和截留漕粮计173.7万石,占动用总数(236.1万石)的73.6%;直隶灾民无偿获得的127.2万石赈粮中,通州仓米占近2/3。

而到1876-1878年旱灾发生时,漕运已严重衰落,京通仓储随之大减,晚清通州仓米经常不到10万石^[16],以至无米可拨;常平仓储全国合计不过数百万石,华北各省储备数万至数十万石不等,形同虚设;政府粮食调度除了拨款买米,只能仰仗已严重不足额的漕粮。

(2) 周边地区余粮输出的减少

境外采购余粮在1743-1744年旱灾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直隶以北的承德地区(古北口外)及东北盛京(辽宁)地区的农业此时已相当繁荣,成为重要的余粮输出地。此次旱灾期间,第一批拨出的通州仓米10万石即为上年(1742年)在古北口外采办;当年秋收后,直隶拨款在口外再次买米近8万石,其中5万石左右用于抵充陵糶,剩余3万石则直接赈灾(表1);在奉天分两次采买粮食15万石,其单价连同运费不超过1两/石^[7]。在旱灾未波及到的华北其他地区,也向灾区提供了大批余粮,如1744年冬小麦丰收,在直隶南部及豫东、鲁西各地采买新麦数十万石,均价不超过1.5两/石(表1)^[7]。长江流域各省采办的粮食数量亦十分可观,虽未动用,也可见当时农业之盛、余粮之丰。

1876-1878年旱灾发生的19世纪中后期,由于人口激增、农业衰落,各省人地矛盾均十分激烈。在华北各省几乎全境受灾的情况下,周边地区如热河此时已由余粮区转为缺粮区,东北及长江流域各省余粮供给能力亦大不如前,这使得赈粮来源渠道大为减少。

(3) 重灾区交通通达性不佳

在1743-1744年旱灾中,位于运河沿线地区的直隶、山东灾区获得了绝大多数清廷调拨发放的赈粮,而距运河较远的河南灾区,则基本依靠自身仓储及采买粮食来调度赈粮,由此可见运河在此次旱灾粮食调度中的突出地位。分布在运河航线上的大量漕船漕粮,有力保障了粮食调拨、发放的高效。而在1876-1878年旱灾中,漕运的衰落使运河对沿线华北各地的补给功能基本丧失,大批赈粮需从陆路转运,而山西、河南重灾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极大地增加了运输成本,降低了调度效率。

① 清实录·1743-08-15(六月二十六日)、1744-02-27(一月十五日)、1744-03-08(一月二十五日)

② 清实录·1744-01-14(十一月三十日)

尽管在 1876 – 1878 年旱灾中, 民间救助(义赈)和来自国外的援助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由于政府救灾强度和效率的低下, 灾害仍造成极其惨重的社会后果; 对比 1743 – 1744 年旱灾中政府主导下高效的粮食调度, 一正一反的两个案例生动说明, 当极端自然灾害发生时, 来自政府的响应是整个社会响应机制中不可替代的环节, 其采取的救灾措施、特别是对粮食安全的保障是否得力, 将对灾害的走向产生关键影响。

参考文献:

- [1] IPCC. Working group II report: Impacts, adaptation and vulnerability [EB/OL]. [2007-12-04]. <http://www.ipcc.ch>.
- [2] IHOPE. Developing an integrated history and future of people on earth (IHOPE): Research Plan (IGBP Report No. 59) [EB/OL]. [2010-10-29]. <http://www.stockholmresilience.org/ihope>.
- [3] 张德二, Demaree G. 1743 年华北夏季极端高温: 相对温暖气候背景下的历史炎夏事件研究[J]. 科学通报, 2004, 49(21): 2204 – 2210.
- [4] 满志敏. 光绪三年北方大旱的气候背景[J]. 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0(6): 28 – 35.
- [5] 张德二, 梁有叶. 1876 – 1878 年中国大范围持续干旱事件[J]. 气候变化研究进展, 2010, 6(2): 106 – 112.
- [6] 曾早早, 方修琦, 叶瑜, 等. 中国近 300 年来 3 次大旱灾的灾情与原因比较[J]. 灾害学, 2009, 24(2): 116 – 122.
- [7] 魏丕信(法). 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 [8] Li L M. Fighting famine in north China: State, market, and environmental decline, 1690s – 1990s [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9] 夏明方. 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及善后问题初探[J]. 近代史研究, 1993(2): 21 – 36.
- [10] 何汉威. 光绪初年(1876 – 1879)华北的大旱灾[M].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0.
- [11] 夏明方. 也谈“丁戊奇荒”[J]. 清史研究, 1992(4): 83 – 91.
- [12] 郝志新, 郑景云, 伍国凤, 等. 1876 – 1878 年华北大旱: 史实、影响及气候背景[J]. 科学通报, 2010, 55(23): 2321 – 2328.
- [13] 中华书局影印. 清实录(第 1 – 60 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1987.
- [14] 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 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M]. 北京: 地图出版社, 1981.
- [15] 郑景云, 郝志新, 葛全胜. 黄河中下游地区过去 300 年降水变化[J]. 中国科学(D 辑), 2005, 35(8): 765 – 774.
- [16] 李文治, 江太新. 清代漕运[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 [17] 曹新宇. 清代山西的粮食贩运路线[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8(2): 159 – 167.
- [18] 曹树基. 中国人口史(第 5 卷·清时期)[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 [19] 方修琦, 叶瑜, 曾早早. 极端气候事件 – 移民开垦 – 政策管理的互动——1661 – 1680 年东北移民开垦对华北水旱灾的异地响应[J]. 中国科学(D 辑), 2006, 36(7): 680 – 688.
- [20] 贾文华. 清代封禁东北政策研究综述[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07: 1 – 32.
- [21] 牛平汉. 清代政区沿革综表[M]. 北京: 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0.
- [22] 张岩. 试论清代的常平仓制度[J]. 清史研究, 1993(4): 28 – 39.

Comparison of Governmental Relief Food Scheduling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during Droughts of 1743 – 1744 AD and 1876 – 1878 AD in North China

Xiao Lingbo¹, Huang Huan² and Wei Zhudeng²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mote Sens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mainly Actual Annals of Qing Dynasty) and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two typical droughts respectively occurring in the flourishing (1743 – 1744 AD) and declining (1876 – 1878 AD) period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North China are selected and reconstructed with historical information about climate background, disaster situation, governmental measures (especially inter-regional relief food scheduling conducted by central government),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refugee migration and revolts). The results of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wo cases are as follows. Governmental relief food scheduling during drought of 1743 – 1744 AD could be characterized by colossal amount, broad sources, and high efficiency, which led to superbly organized famine relief and well maintained social order. In contrast, during drought of 1876 – 1878 AD, relief food raised by government was extremely limited in both amount and sources, and even worse, inefficiently transported to disaster area. Consequently, mass emigration and numerous revolting events broke out in and after the drought. The transformation occurred in the background of agricultural depression in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interruption of Grand Canal, and decline of water transport & storage system. In addition, the different transport accessibility of disaster areas of the two droughts wa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in relief food scheduling.

Key words: North China; historical droughts; social response; relief food scheduling; Actual Annals of Qing Dynasty